

更高举起改革开放旗帜

深化改革驱动全面绿色转型

胡军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新时代党治国理政新理念新实践的重要标志,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方向指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科学设定了绿色转型的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推动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重大步伐。同时要看到,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仍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和全球性挑战仍不容忽视,迫切需要进一步发挥改革的驱动作用,破除阻碍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强劲动力。

以改革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过去,一些地方简单“以GDP论英雄”,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实践证明这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首要的是转变思想观念,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把握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的辩证统一关系,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只有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才能冲破传统发展思维束缚,真正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改革是推动国家发展的根本动力,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力量。一方面,改革有利于激发绿色发展活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加快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任重道远,产业结构高耗能、高碳排放特征依然明显,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状况仍将持续。必须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突破结构性障碍的制约,加快优化调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

地结构,推动形成绿色生产和生活方式,持续激发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内生动力。另一方面,改革有利于破除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障碍。经过新时代以来的改革创新,我国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不断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实现系统性重塑,生态文明“四梁八柱”性质的制度体系基本形成。但也要看到,降碳、能源等方面的制度和政策保障与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尚有不适应的地方,必须锚定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落实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各项任务,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为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重要支撑。

把握内在规律和重要原则

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绿色低碳发展,需把握其内在规律和重要原则,运用科学方法,在不断实践探索中前进,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更为显著的成效。

不断推进制度和实践创新。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着力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初步建立起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赔偿、后果严惩等生态文明制度框架,生态环境法律和制度建设进入了立法力度最大、制度出台最密集、监管执法力度最严的时期,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一系列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必须一以贯之,要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推动生态环境治理效能不断提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充满艰辛、未知和风险挑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新的思路和方法,大胆试验、大胆突破,通过改革创新来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体制机制更加成熟更加定型。

注重系统集成与突出重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以改革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既要整体考虑、全局把握、协同推进,把系统观念贯穿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全过程,促进改革目标相互兼容、改革举措相互配合,政策取向协同一致,又要找准主攻方向,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围绕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农业、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

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更多实效。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为了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改革,改革才有动力。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也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和受益者。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满足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突出环境问题。必须以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改革实效的重要标准,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制度机制,让人民群众呼吸上新鲜的空气、喝上干净的水、吃上放心的食品,生活在宜居的环境中。还要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形成全社会共同推动绿色发展的强大合力。

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聚焦建设美丽中国”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七个聚焦”之一,对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落实各项重点任务,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保障。

促进形成绿色空间格局。构建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空间格局,健全科学高效的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明确各类空间的功能定位和开发保护要求。根据不同区域的生态环境特征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实施分区、差异化、精准管控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打造绿色发展高地,加强区域绿色发展协作,统筹推进协调发展和协同转型。

建立绿色低碳经济体系。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培育和发展绿色低碳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绿色化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完善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加强资源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推广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等技术和产品。推进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拓宽绿水青山转化金山银山的路径。健全绿色消费激励机制,优化政府绿色采购政策,推广绿色出行、绿色建筑、绿色办公。

聚焦建设美丽中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健全“双碳”工作机制。稳妥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加强对气候变化的监测、评估和预警。推动交通结构转型升级,协同推进交通运输减排降碳。建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构建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产品碳标识认证制度、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建立地方碳排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健全碳市场交易制度、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制度,运用市场机制促进碳减排。

完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健全绿色转型财税政策,丰富绿色转型金融工具,积极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等,创新和优化投资机制,深化电力价格改革,进一步完善阶梯水价等价格政策。健全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提高生态环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统筹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能源利用、应对气候变化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修订工作。建立碳达峰碳中和标准体系,加快节能标准更新升级,完善可再生能源标准体系和工业绿色低碳标准体系。

强化绿色科技创新支撑。推进绿色低碳科技革命,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建设绿色智慧的数字生态文明,深化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运用,构建美丽中国数字化治理体系。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强化生态环境领域技术与信息、生物、材料等变革性技术的交叉融合创新。聚焦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低碳零碳工艺再造、新型电力系统等领域,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实施生态环境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完善激励机制大力培养创新人才,优化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夯实绿色转型智力基础。

(作者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推进,能够激发人力资本创新活力,为重大知识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提供高水平、高效能、高质量的智力支持,进而推动劳动形态、产业变革和生产方式等实现创新性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和紧密结合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发挥其引领作用,持续增强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目标一致性、系统集成性和要素流动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以创新为引领,增强目标一致性。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的先进生产力形态。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也是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三者“一体化”发展、良性循环的重要目标。在创新目标引领下,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方向具有清晰的内在一致性,三者相互依赖、相互支撑。不过,从目前来看,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在实施主体、工作重点等方面尚存在条块化、分散化、单一化发展等问题。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迫切需要以创新为引领,强化整体目标一致性,实现同向发力,进一步优化教育方式、科研组织方式和人才培育方式,形成教育、科技、人才互动共生格局。紧紧围绕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做好统筹谋划布局,充分发挥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抓好规划纲领和组织体系设计、政策举措落实。健全政策工具沟通和协调机制,建立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建设标准体系和指标评价体系,推动三者有机贯通和深度融合。

高效协同发展,增强系统集成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从系统观点看,形成教育引导科技发展、科技催生创新人才、人才驱动科技进步的良性循环,实现“1+1+1>3”的系统集成效应,客观上要求各子系统之间“强强联合”,不能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有明显短板。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实践来看,在生产力发展演变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各国在教育、科技、人才领域的发展并非完全同步,但世界主要教育中心、科技中心、人才中心在时空上通常呈现同构化特征,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往往高度重合,这是通过三者高效协同、良性循环而形成的。对标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我国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如何从“规模大”向“质量高”转变、如何更好补短板提质效,仍面临诸多挑战。要按照教育、科技、人才事业的定位和发展规律,发挥教育在国民生活中的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作用,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建设和拔尖人才培养,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更好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提升原创性和颠覆性科技创新能力,完善科技创新生态,形成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重大创新领域和科技创新高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树牢“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职普融通,壮大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更好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

优化资源配置,增强要素流动性。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促进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关键在于让各子系统“活”起来,实现劳动者、劳动资料等更广范围、更高层次的优化配置。其有效途径在于锚定“畅通”,通过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等改革,破除制约劳动力、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要素顺畅流动的障碍,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促进各类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其中,人是更活跃、最具创造性的因素,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推动者。要激发人才动力、释放人才活力、挖掘人才红利,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和评价体系,健全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更好体现人才市场价值,丰富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人才交流通道。同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有组织科研,以重大科技创新平台为依托,发挥政府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布局、宏观政策引导、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引领作用,整合政府、市场、社会各方面力量,促进更多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主动适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形势,持续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营造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在世界范围内集聚科技成果、智力资源和高端人才,在开放合作和融合创新中提升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水平。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本版编辑 李子娇 美编 吴迪
来稿邮箱 jirbll@sina.com

锚定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

方晓霞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形态。相对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具有更高的技术水平,展现出更高的发展效能,更符合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发展生产力的新的重大要求。构筑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需要把握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聚焦高技术,以前沿技术突破为动力

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代表着技术的发展方向和领先水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2023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3.3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4%,发明专利申请量、通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多年蝉联世界第一,在载人航天、量子信息、核电技术、大飞机制造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科技实力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每一次生产力的跃迁都建立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扩散和广泛应用基础上,这些技术的产业转化和应用形成先进的新型劳动工具,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带来社会生产力的质的飞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传统意义上的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的边界日趋模糊,科技创新链条更加灵巧,技术更新和成果转化更加快捷,产业更新换代不断加快。人工智能、物联网、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形成的新兴产业成为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制高点。这些技术影响范围广泛,引领各行业各领域发生了以绿色、智能、泛在为特征的群体性技术革命。同时,这些技术交叉融合、相互赋能,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面貌,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聚焦高效能,以生产效率提升为标志

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通过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升要素组合效能,带来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随着我国优质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和环节向高生产率、高边际产出部门和环节转移,各种要素的单位产出将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将大幅提升。数据显示,从2012年至2023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从72817元/人增长至161615元/人,年均增速约为7.5%,经济体系整体产出效率不断提升。

回顾历史,每一次生产力能级的跃升,都表现为劳动者技能的提升、劳动工具的进步、劳动对象的拓展以及三者组合方式的优化。当前,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数据成为关键的新型生产要素,推动新型劳动对象和新型劳动资料不断涌现。在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强大赋能下,知识生产方式正在发生显著改变,“人+人工智能”使劳动者的创造性、能动性和劳动效率进一步提升。新能源和新材料等领域前沿技术的迭代升级以及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非实体形态生产工具的出现和广泛应用,赋予

生产制造设备更多自动化和智能化功能,使其可以在生产过程中自主完成更多复杂任务,不仅有助于减少劳动力投入,提高生产连续性和稳定性,而且可以通过智能排产,模拟和预测生产资源调配、在线检测,实现企业各业务单元以及供应链各企业间的高效协同,从而进一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提高运营效率。

聚焦高质量,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方向

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符合新发展理念的要求,摆脱传统的粗放型发展方式,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近年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呈快速增长势头,数字经济规模和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成为出口亮点。截至2023年12月底,国家两化融合公共服务平台服务工业企业18.3万家,培育国家级示范工厂421家,省级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超过1万家,“灯塔工厂”数量占全球总数的40%。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传统产业低端低效、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方式正在转变,焕发出新的生机活力。

从历次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看,生产力的每一次重大跃迁都催生出一批新产业,带来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更迭,新的通用目的技术会赋能传统产业,推动经济体系整体技术水平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作为典型的通用目的技术,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深度融合可以优化生产流程、改进生产工艺、增加产品功能、拓展增值服务,在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能耗和排放、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供应链响应速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产业向更高层次、更高附加值、更绿色低碳的方向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而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具有环境友好、绿

色低碳的特征。节能环保、新能源、低碳等新技术新产业能够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工艺和设备升级,实现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循环化、能源消耗低碳化、产品供给绿色化,推进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绿色转型,进而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形成适配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

加快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和完善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一是建立健全支持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体制机制。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并举,持续完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机制,支持多技术路线探索;提升创新人才在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决策和管理方面的自主权,努力营造崇尚创新、宽容失败、潜心研究的环境。二是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鼓励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合作共建一批概念验证、中试熟化、小批量试生产等面向社会开放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打通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风险补偿资金、概念验证基金、种子基金等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资金支持,完善适应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金融支持模式。加强技术供需平台的渠道建设,积极发挥科技中介机构的桥梁纽带作用,让企业家与科学家实现深度对接。三是健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体制机制,加快新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的融合创新,支持企业数字化、绿色化和服务化改造升级,塑造竞争新优势。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畅通

赵峰